

狗仔隊與引人矚目的公眾人物

——論香港的特區政府五年來傳媒政治和平庸管治

◎ 陳政成

緒言

在本文中筆者將提出一有關研究香港政治與公民社會的新理論，它是建基於近期本人對香港散漫的公民社會結構的觀察，發現它從過往的政治官僚管治，變為著眼於引人矚目的政治人物身上，成為媒體消費主義，再加上狗仔隊、民粹主義混合成一不理會任何公眾輿論聲音的新管治模式。

由於學者大多對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前後所推行的民主化發展普遍存有懷疑之心，所以大部分有關香港政治輿論的研究，均是著眼於香港公民社會的陰暗面。如劉兆佳教授所指出香港在殖民地政府管治下是一低度整合社會（1982）。其他學者如趙永佳（Stephen Chiu, 1994），他研究1997年回歸前香港的權力架構，他將之描繪成內部缺乏來自公眾的聲音，及一具極權主義性質的國家-資本聯盟。直到1998年之前的30年，不受干預的經濟成功，「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變成受歡迎的意識形態，這引致不易被察覺的極權主義的管治，不積極的政治參與及反共思想，這亦保護了香港免受北京政府的公然干預。由於港人相信公務員在管理公共開支方面的能力與有效率的管理，市民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給予作為精英階層的公務員發揮的機會。

另外，張炳良（1997：94）更加以補充認為香港的高級公務員被描繪成（如90年代追隨公共管治主義的世界趨勢已實行公務員改革般）一更好、更有效率的管治者。然而，在1998及2000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之後，特區政府由於無力應付高失業率和龐大的財赤，使已陷入忍受性危機的高級公務員不得不更積極爭取在新聞媒體曝光，及更願意與那些和他們政見不同的民選議員辯論現有的政策。這種突變亦改變了公眾對個別決策官員的看法，由過往基於他們在議會中的表現，轉為注意他們個人的公眾形象。這轉變給公共空間中引人矚目角色一重要提示：議會政治中的理性討論已被忽視，取而代之是公眾對決策官員的注視。

由公共空間政治到引人矚目角色的政治

要追溯現今香港那種國家-資本聯盟和官僚主義權威的基本理論，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 1989）歸納公共空間是由坊間之言昇華至公民藝術及公共政策，是國家結構的時尚發展和進化的結果。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則提倡另一政治整合模式，當公眾的輿論被媒體捏造成一種文化的生產方法，來控制當權者的意識形態。可是葛蘭西（1971）揭露媒

體文化工業是擁有吸納、表達、分解及取代任何反對當權階層言論的力量。由於我們日常生活及文化模式是社會文化範疇的一部分，所以亦可用來推論公眾輿論對現存政體的認受性（Althusser, 1971; Hall和Jefferson, 1978; Laclau和Mouffe, 1985; cf. Ku 2001: 123）。在談到香港的公共空間，谷淑美（Ku 2001: 122-123）總結統治者與反對者並存的空間，市民可在這空間以較有公信力的政治論述，象徵性自由和理性，以公眾輿論挑戰政府的合法性。

最近本地政治出現的趨勢是：公眾不是要求有素質的公眾輿論，或者少數支持民主的輿論領袖不是要求政府有更多的公眾責任及可信性。依筆者觀察，特區政府踏進五週年紀念所發現的現象是：狗仔隊式政治的出現，一些公眾人物利用傳媒的報導來提高他們的聲譽，就如他們是廣泛被接受的公眾人物。雖然公共空間也許適合作為分析政治、經濟動向的地方，但這卻不適合於形容近期香港的發展趨勢，這趨勢可說是完全閒暇及侵蝕本地的公共空間發展，但可惜這卻是現今政治發展的大趨勢。鮑曼（Zygmunt Bauman）在其著作所提出的例子則證明這事實上是被顛倒的（2000: 70）：

現時所發生的不是另一次重新審查在私人和公眾之間，甚麼是聲名狼藉的活動界線？現時看來需要的是重新界定公共空間的定義？公共空間已被人利用作在公眾面前展示和讓他們觀看，甚至是在眾目睽睽之下亦不停地作私人表演的場地。他們的所作所為可說是將一切其它非私人的問題擠出公共議程之外，甚至使公眾對「公共事件」的理解轉至公眾人物的私人瑣事。

公眾人物勇於暴露他們的私人遭遇，策略性地贏取一般市民大眾對他／她在困境中給予同情，甚至不理會他／她所做的公務是錯與對。筆者堅持現代政治發展由古希臘的民眾大會到現代的中產階級公民社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是唯一的政治行動領域，作為傳統的政治分析人和社會學人，筆者對這概念甚為看重。筆者提出公眾人物作為引人矚目角色，其實是一種對他們在合法性的政治遊戲中所扮演角色伸延的補充，這有別於政治制度所決定的一般政治後果；大家對公眾人物所扮演引人注目角色的理解，是他們在現今殘酷的政治領域中能適者生存之道。因此，鮑曼（2000: 68）的研究可說是將我們的注意力從市民理性討論的領域轉到傳統文化生產功能方面的討論。公眾人物經常出現於清談節目及公開討論他們的個人閱歷。

就此，鮑曼更提出一要點：清談節目滿足大眾對公眾人物的窺視要求；更確實地說，公眾作為普通市民，在得悉公眾人物如何克服困境、情緒崩潰及他們生命中的低潮，這在大眾面對不穩及不安環境時，起著幫助及教育他們克服困難。筆者將稱這些整理的個人遭遇，轉化為文化產品在媒體的渲染，而這些個人軼事將會深入影響與他們有或多或少共同經歷的電視觀眾。鮑曼（2000: 69）更補充了一點，公眾人物在清談節目較有優勢；他們在節目中更公開及更輕鬆地討論他們更私人的瑣事，這是十分貼合公眾討論（public discussion）的需要。感謝現今廣播技術的高度發展，使媒體能在同一時間更有效地接觸到公眾人物的視覺及聽覺資訊，並引一起之後一連串的討論。

雖然，清談節目只容許公眾人物與大眾作有限時間的對話，但它無可置疑是沿著文化工業生產的邏輯及操縱著潛伏觀念的發展。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973: 235）卻提醒我們要留意物質藝術再複製能力的潛在危機；它們複製的力量和不斷複製的能力，令人們適應了一沒有創造力及不同的無盡生產理念，而這是貼合於極權主義和烏托邦思想。亞多諾（Theodor W. Adorno）亦提出近似的警告：這不是大眾輿論令大眾變得無知；作為公共空間的不良產

物，那是由於公共空間發展不良的後果，使任何公共事務的理性討論被擱置、公眾輿論被捏造和製造。雖然，就如英女皇伊利莎白二世在白金漢宮的露台向她的臣民揮手，過程大多是獨白多於對話的，她從沒有嘗試和關外的臣民對話，而她的臣民亦只是注視和祝福她，但這亦是筆者所說的引人矚目的角色；公眾人物可能永遠沒有和公眾作正面對話及接觸，只是受到他們的注視及聆聽其說話，他／她亦可說是這些引人矚目的角色。

狗仔隊和他們的受害人

在筆者繼續有關公眾人物正面使用引人矚目角色以私人事務，提高個人形象的爭論之前，讓筆者描述狗仔隊和政治因素在筆者分析香港當前形勢之重要性。狗仔隊和他們的新聞報導經常被視為令人討厭的坊間就有關公眾人物的八卦之言。就如令人討厭的狗仔隊在1997年對英國戴安娜皇妃的貼身追蹤採訪，導致發生交通意外，英皇妃魂斷花都。對此，狗仔隊託辭他們窮追、監視有花邊新聞的名人私生活，是為了滿足眾人的偷窺心態。這是將私人瑣事轉變為公眾問題。若狗仔隊的報導能夠使備受尊重的人物困窘，會刺激該報的銷路或推高讀者的閱讀率，同時亦可為媒體業帶來可觀的利潤。狗仔隊的孿生兄弟可說是政治醜聞，因它是有極高機會發掘出具備極高新聞價值的個別事件。

為了分辨狗仔隊新聞報導與醜聞的結合，湯普森（John B. Thompson, 2000: 18-9）對醜聞的話題做了深入的研究。他發現大部分醜聞是揭露政客的秘密婚外情和預先假定公眾不能接受及違反家庭責任這道德觀念，婚外情是不為大眾所接受的，因它會削弱公眾對他／她所給予的信賴和其本人的聲譽。若該人物不能好好處理這些醜聞的惡意報導，這將令他們在沒有被同情下受到責難，甚至被轟下台及結束政治生涯。這解釋了為何反對派人士甚有興趣於發掘當權政黨和政治人物的任何醜聞。隨著狗仔隊式的報導日漸增加，筆者發現這裏有兩項接著發展的趨勢：（1）有關公眾人物的私人醜聞，不論它是蓄意或不願意透露的，一經揭露即很快與他們相關的公事扯上關係；（2）有關類似的新聞報導正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增長，並模糊了公事與私人瑣事之間的界線，削弱大眾對這些公眾人物處理公務能力的監察能力。

因此，引人矚目的政治人物，不論在主導或反對的意識形態下，也不能在政治制度上處理這些醜聞。狗仔隊的增加可說結束了公共空間特定的政治元素，而政客的訊息在短暫的消費主義影響下亦變成沒有政治性。政治活動已被虛擬的公眾消費形象所影響，不再受任何道德規條所規範。

在談到被狗仔隊所傷害的公眾人物，筆者將提出不誠實的前民建聯¹立法會議員程介南的例子來加以說明。他的故事是醜聞典型例子，由於在他被逼至牆角時的反應遲緩及甚至仇恨傳媒的騷擾，令狗仔隊對他毫不留情地反噬，筆者可以說在速成程介南受到譴責的過程中，狗仔隊是扮演著一個重要角色。

程介南的醜聞始自2000年9月，他的公關顧問公司的一位前女僱員，將一些程氏不能曝光的資料給予一本地報紙的狗仔隊。這些資料是有關他做立法會議員時所接觸到的康樂及文化政策文件，其中亦涉及一些敏感及不正當行徑，這證明程先生違背了公眾對立法會議員的信任，廉政公署²加入調查，最後程氏被判有罪並由此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對於程介南這案件，筆者不想再爭論程先生的對或錯，筆者關心的是媒體如何利用狗仔隊來加強公眾輿論和閒話對案件的影響，使程介南受到媒體和正式法律程序的雙重審判。狗仔隊對程氏一案所關心的不是程介南的瀆職，而是窺探程先生用情不專的細節。狗仔隊查悉程先

生於數年前已和太太離婚，並正與一中國大陸女子共墜愛河，由於這位小姐渴望進入本地某大學修讀碩士課程，程先生為了取悅佳人，便幫她跨越正常途徑，寫信給大學推薦她入讀。就此狗仔隊對這所大學作出有關入學申請的查詢，並對程先生的前妻和他的新歡作出貼身的追蹤，其後更以不可盡信的所謂調查結果捏造故事，程介南不能忍受他們的滋擾，並對該報社發出具法律效力的警告信，但有趣的是公眾對程介南事件有極為自相矛盾的反應。雖然，學術界均預測程氏這宗政治醜聞會拖低民建聯在2000年立法會直選的得票率，但選舉的結果打破這些預測，公眾仍然支持該黨並投它的候選人一票，反映選民沒有被程氏的醜聞影響，在程介南被判有罪後，揭發這宗醜聞的報章訪問了兩位市民的意見，其中一位接近六十歲的男子認為程氏是罪有應得，因為他卑鄙和不負責任；另一位身形較豐滿的女士則表達了不同的觀點，她認為程氏對自己的用情不專已有悔悟。（2001年12月23日）³

從程介南這醜聞筆者可有甚麼得著？狗仔隊用滾雪球式的策略使更多角色牽涉在他們報導的故事中，因此醜聞多以一些不尋常的意外事件作開始，從而揭露出一些公眾人物願意或不願意透露的秘密。就如福爾摩斯的偵探故事，狗仔隊四出翻查與故事內容有關的任何事項，這似乎違反了新聞報導傳統保持中立及公正的操守。在這裏我們可發現公眾人物被醜聞所傷害的步驟是：首先，狗仔隊找出適合報導的目標人物，他們的行徑與其聲譽有所抵觸；其次，狗仔隊對於目標人物周圍有關連的角色亦不會放過；三，如果故事是有吸引力及複雜的，傳媒會基於一些大眾所接受的社會道德標準宣判目標的罪狀，就如程介南事件便是典型的性醜聞，審判程氏的道德標準便是家庭價值和傳統的一夫一妻制，這削弱了大眾對程介南的公共能力和誠實的信任。因此，他的醜聞是被對他個人失誤的過分渲染，並覆蓋有關他原本作為立法會議員的不當行為。

個人生活閱歷和閒言閒語的正面運用

程介南先生的遭遇也許是香港歷史上最不幸的醜聞例子，但別的公眾人物似乎已從這醜聞學會如何應付狗仔隊。香港作為一個沒有完全民主的城市（或稱為地區），它只有少數民選的立法會議員，而特區首長是由數百名選舉委員投票選出，再經由北京政府正式委任，因此特首何說是沒有任何民意基礎的，所以他所委任的問責制局長不單需要從公開的討論中說服公眾，並要製造更多支持政府的輿論來增加公眾對自己的支持（認受性）。此外，他們的「公眾形象」亦被媒體廣泛傳播及被大眾所討論，這將影響公眾如何理解他們所制訂或執行的政策。

另一方面，有不少政治人物嘗試將狗仔隊善加利用，因為若能正面使用這些八卦之言，它可推動公眾對自己的支持，當然這些支持不可說是源於公眾對他的決策的認同。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2001年立法會會議上讀出他首份財政（更是赤字的）預算報告時，他唱出羅文的「獅子山下」。這動作似乎像他個人表演多於別的。事實上，梁司長扮演著一個來自草根階層的象徵，他這樣的動作就如何向大眾展示：「我們同時來自草根，筆者會大家甘苦與共。」事後香港電台電視部⁴亦精選幾集具代表性的「獅子山下」在亞洲電視的黃金時段重播，希望能藉此舒緩港人在2000年全球經濟衰退後所產生的怨氣。

無論如何，梁司長可說比程介南聰明一點，他也是在數年前離婚，但他在其仕途上最重要的一刻（他讀出他首份赤字預算報告），向公眾宣布他和中國跳水皇后伏明霞共墜愛河。由於梁司長年屆五十多，但伏小姐只是二十餘歲，突然宣布的梁伏之戀轉移了公眾對財赤不滿的

視線。梁司長和伏小姐在2002年結成佳偶，他們的婚事可說是包含有中港兩地政治婚姻的意義。同樣地，為了增加梁錦松自己對公眾的吸引力，他亦在不同的公眾場合增加自己與年青人的接觸和唱本地的流行歌曲。梁司長不像程介南，他能高明地將自己一段引人矚目的婚姻掩飾了他過往一段不愉快的經歷：這在公在私均是他生命中的污點，並暫時將之轉移了公眾對財赤的不滿和增強自己的公眾形象，這可說一箭雙鵰，是一如何利用狗仔隊使自己更能引人矚目的上佳之作。

在其它方面，引人矚目的角色亦促成一定的政治目的：香港本地的草根階層作為典型媒體流行文化的產物，使這些角色衍生出廣泛民粹主義的政治吸引力。民粹主義是一政治活動，或更精確地說是運用政治手段來煽動群眾，同時產生相同的情緒反應，以大眾傳媒和論壇等方法來對抗精英（Lipset ed.; 2001）。更精確地說，它其實是將公眾的注意力，從理性的現實或公共空間中的政治程序轉移出來。

引人矚目的角色和民粹主義作為政治遊戲的一部分，筆者將以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女士作為例子，葉太被認定是政治遊戲的最出色的參與者。狹義來說，她據筆者所知亦是最突出的參與者，葉局長為兩大棘手問題制定政策：作為居港權和內部保安政策的決策人，葉太成功地展示她的公關技巧，以透露出個人的不愉快遭遇來抵銷公眾對她的不利抨擊。

葉局長之所以不受港人歡迎，或可說是聲名狼藉，這可說是源於她強硬的鐵娘子作風和她喜以對抗形式對待任何反對人大釋法的民間團體。在葉局長力辯特區政府在無條件居權人士事件上的立場，她下令拘捕於2001年6月26日衝擊行政會抗議政府遣返居權人士違反人權的學生領袖。當特區政府在給居權人士的寬限期（至2002年1月28日）內遣返居權人士，公眾開始有點兒同情這些居權人士，反對政府的極權主義行動。一位名叫賴依芙（Naive）⁵的藝術家（偽名）以葉司長的極權形象和她的像掃把般的髮型，加上緊身束腰帶的軍服，創作了一個極具諷刺力的卡通人物叫「掃把頭」。這卡通人物的創造是對特區政府如希特拉般的極權形象的一大嘲諷，它亦甚受到一般市民歡迎，並為出版商和創作人帶來不少進賬。

雖然葉太曾多次公開表達對賴依芙的「掃把頭」這劣名十分討厭，同時她卻利用這劣名將之改來作為反攻的有利機會。在2002年2月7至8日，葉太應邀為亞洲電視一清談節目作嘉賓，節目的主持人是有「名嘴」之稱的黃霑，他亦是前文提及「獅子山下」一曲的填詞人。在節目中，葉太盡訴自己過往的經歷，訴說自己是在一新加坡移民家庭中成長，其後父親生意失敗及逝世，她是要給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進入香港大學修讀英國文學及完成在蘇格蘭的碩士課程，接著她加入香港（殖民地）政府工作。直至有一天，她的奶媽以她已年過標梅，並催促她快點結婚，她便下嫁了給她的丈夫。在節目中，葉太描述自己是一個普通的弱質女流，來自一個令人悲傷的家庭。

另外，她的丈夫由於有父蔭，所以沒有甚麼野心及抱負，只會耽迷於上網和可口可樂。1997年之前，葉太正忙於處理回歸的棘手事項，她的丈夫突然病危及捨她已去，留下一女兒給葉太照顧，自此她除了應付日常繁重的工作外並要母兼父職照顧女兒的起居飲食，由此博取了不少觀眾的同情。葉太在節目中向公眾訴說她如何堅強應付自己的不愉快經歷，她需要付出比普通婦女更多的努力來應付周遭的挑戰。有關葉太個人遭遇的這輯訪問十分受歡迎，在眾多的觀眾要求下這輯訪問在短時間內重播，這是十分罕見的。在這裏我們可發現葉局長是如何懂得掌握公眾的情緒，善用公關技巧改善她在公眾心目中不受歡迎的形象，這亦同時進一步證實鮑曼所提出有關清談節目的論點。但他在分析公眾人物在媒體透露個人遭遇亦有遺留之處：就是市民在集中注意公眾人物矚目之處時，很多時是會短暫遺忘一些對他們的理性審

評及討論。更確切地說葉太可算是一極善玩弄公關手法的公眾人物，能成功地維持公眾對她的注目，她能毫不顧忌地講述自己任何瑣事，包括她的纖體計劃、她的掃把狀髮型、她的女兒、她的珍珠項鍊，甚至她那佩戴太陽眼鏡的冷酷形象。就如他的英文名字Regina（拉丁文解作皇后），葉太經常將自己裝扮成一個令人敬畏及華麗的形象。鮑曼就此分別在權限和權威二者之間作了深入的觀察，並有以下的論述：

哲學家和思想家的關於新聞之理論架構，往往受普及藝術琢磨，再沒有人質疑其新聞真偽。看過電影「依丽莎白一世」的觀眾都知道，身為大英帝國的女皇是一種自我身分創造和自我認同；作為亨利八世的女兒，要具有雄才偉略和英明決斷，使喋喋不休、冥頑不靈的孤臣孽子俯首稱臣；要朕即國家、萬民敬仰，伊丽莎白一世女皇仍需靠華裝豔服和轉換髮型，這些英明的外表形象來臣服眾朝臣，萬世不衰。（2000；179）（筆者按，中國諺語說：「人靠衣裝，佛靠金裝。」）



上面顯示是葉太的不同形象，中間：是穿上優雅紅色套裝；左：賴依芙《掃把頭》（香港：四畢像出版社，2001）的封面，並加上一句：「生人勿近」作副題；右：最近出版的《我愛掃把頭》（香港：四畢像出版社，2002）封面，展示一極權主義者柔弱的一面，葉太被繪畫成性感尤物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的一個家傳戶曉的造型——她被風吹起裙子的撩人姿勢。但賴依芙卻給她添上手鎗和褲頭的手銬。這一軟（性感撩人姿勢，泛指公眾的注意力）和硬（手鎗和手銬，泛指強硬的暴力）並置，給我們解釋了在極權主義趨勢下引人矚目的角色和民粹主義的相關之處。

因此，葉太可說是貼切的例子，她預期在華麗服飾之下能維持公眾對她的注目和支持。在這些預期公眾形象支持下，葉局長急不及待下令警方於2002年4月25日進行清場行動，驅逐霸佔遮打花園（這位於立法會旁的公共休憩地方）久候多時的示威居權人士。與此同時，她亦疏忽地容許警方用手銬押走站在非採訪區的記者，因恐他妨礙警方的清場行動。此事引起一連串來自本地和外地新聞工作者對她的指責。然而，由於大部分港人均認為居權人士在香港是白取福利救濟，政府強行將他們強迫遣返亦無不妥之處，在這段時間葉局長的民望在一本地常規的民望調查中獲得比董特首還高的民意支持率。其後在立法會會議上，葉局長再展示奧地利總商會（Austria Chamber of Commerce）的支持信來辯護她在遣返居權人士作強硬態度。政治評論員吳志森指出：民粹主義高漲和特區政府害怕，政府會處心積慮地通過更多惡法來限制市民與它的對抗。（《信報》，2002年5月17日）

上述吳先生的預測其後證實是十分準確。在10月特區政府提出替基本法23條立法⁶，葉局長狡辯立法，只是防止顛覆北京政府的政治活動在港發生，及澄清法律上的灰色地帶，藉以加強執法的效力。在毫不理會來自本地民主團體、天主教教會和人權關注組織的反對之聲下，她

更訂下程序要在2003年6月完成立法。這時葉太的夫家發生爭奪她老爺遺產的訴訟，在問及葉太對此事的反應時，她卻奇奇怪怪地透露她的母親已界50高齡，是一二線的小明星嫁給他的父親作填房。她似乎希望藉此個人身世故事重施梁錦松的技倆，來轉移對她不滿的視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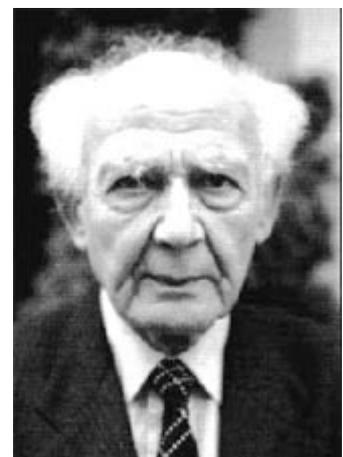
總結：狗仔隊、民粹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趨勢

數十年前，亞多諾和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 1979）已估計出對將來的文化工業傾軌於極權政府，和勞動力的異化使人們失去了批判現存社會的知性。但這命題被鮑曼所修正，他將重心由勞動力異化轉移往短暫的形象消費主義，如購物、窺視和注視（Bauman 2000：82ff）。個人消費揭露了公眾人物（他或她）的私人生活，鮑曼懷疑如果真實的自我能代表主觀的事實是否可行，他認為為尤其在現場的訪問節目，公眾人物的禮貌和誠摯將掩蓋他們的真我一面。真摯的個人表白是任何成功的商品化的個人閱歷故事能滿足媒體觀眾的窺視、注視與八卦討論之要訣所在。程介南所以不能駕馭狗仔隊是由於他的不誠實，梁錦松和葉劉淑儀所以能在媒體政治競爭環境中生存和成功，正是因為他們願意利用自己的生活瑣事，並巧妙地控制公眾輿論變成自己困境的緩衝地帶。雖然他們仍沒有找到解決方法，這引人矚目的角色為我們將來作有關研究帶來兩項啟示：(1)根據韋尼克（Andrew Wernick, 1991）所論述在「阿甘正傳」（Forrest Gump）的神話中是強化個人冒升進取的中產文化，就如中產階級深信「每一個人均是從平常中開始」；(2)大眾對平庸管治的懷疑，由於某一引人矚目的角色而拖延了一些無可避免的政治危機的爆發，這是有別於一般韋伯（Max Weber）的理論，合法性管治是源自管治者的個人魄力和才能。

也許，只要我們把引人矚目角色的結果不僅是政治的文化消費主義，亦是有權力及決心的公眾人物在大眾的敬畏目光和自己華裝之下，合法使用暴力的伸延。就此鮑曼（2000：109）卻似乎提供一合理解釋，這也許是最切合用來診斷過去五年內特區政府的平庸管治——現時香港人所恐懼的根源是恐怕香港在珠江三角洲經濟全球一體化後，失卻它和其它太平洋地區城市（如上海）的經濟優勢：

政府們對外來的被管治的個體—移民，似乎它們高估自己撫順移民的能力，成為政府們焦慮之源。政府把焦慮和游離的移民成一陣線，成一眾「他者」的文化建構，納入一個民族社群的歷史想像之中，政府們只可以這樣做。

鮑曼的觀察所得可作預示：政府恐懼失去國家和地區身份，和移民他者（the immigrants as others）所挑戰，國家和地區的管治二者趨於極權主義。將這分析放在香港的情況，我們會發現比這論點更多的啟示：特區政府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是在於它能否維持香港作為一國際金融城市的地位。由於1998和2000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加上大量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的低學歷和非技術性移民，使香港的經濟發展承受一定的壓力。特區政府似乎要整理好它的移民政策，及緩和中產階級在97回歸後所累積的不滿。從過往數年筆者所觀察看來政府似乎傾向於以極權主義模式來處理居港人士這問題，及對於解決香港的經濟問題無能為力。筆者所擔心的是在政府無能為力管治之下，使引人矚目角色和極權主義當道，再加上民粹主義，使它的危機感變得遲鈍。這般的發展只會使問題變得更複雜，市民怨氣日深，實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只有火上加油。



鮑曼 (Zygmunt Bauman) : 「公共空間已被人利用作在公眾面前展示和讓他們觀看，甚至是在眾目睽睽之下亦不停地作私人表演的場地。他們的所作所為可說是將一切其它非私人的問題擠出公共議程之外，甚至使公眾對『公共事件』的理解轉至公眾人物的私人瑣事。」

參考書目

Theodor W.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Verso, 1979).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1).

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New York: Fontana, 1973).

Cheung, A. B. (1997) "The Transition of Bureaucratic Authority: 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Senior Civil Service in the Post-1997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in P.K. Li ed., *Political Order and Power Transition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79-108.

S. Chiu, *The Politics of Laissez-faire-Hong Kong's Strategy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ccasional Paper no. 40.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4).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 Smith.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ie Socie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2/1989).

Stuart Hall et al.,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78).

Agnes S. Ku, "The 'Public' Up Against the State-Credibility Crisis and Narrative Cracks in Post-Colonial Hong Kong",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8 (1): 121-44.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85).

Lau Siu-kai,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2).

Seymour M. Lipset ed.,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ories, Thinkers, Concept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1).

Norman Miners,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J. B. Thompson, *Political Scandal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Andrew Wernick, *Promotional Culture: Advertising Ideology and Symbolic Expression* (London;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1).

吳志森：〈民粹主義幽靈已在香港上空徘徊〉，《信報財經新聞》，2002年5月17日。

註釋

- 1 民建聯是創立於1992年7月10日的政黨，主要是聯繫本地的親中團體，以動員香港的親中政治力量，來參與香港的直接選舉，強調愛國恩怨和鼓勵支持參加建設香港，它的假想敵是民主黨，一個由李柱銘和一批民主派人士所創立的政黨，作為推動本地的民主化步伐。
- 2 廉政公署 (The Independent Co-operation against Corruption, ICAC)：由前港督麥理浩 (Crawford M. Maclehoze) 於1974年下令成立的獨立反貪污組織，以即時顯示政府對打擊當時嚴重的警察貪污的決心。ICAC主要的職責主要是調查在私人和政府部門／機構的貪污罪行，和根據《防止賄賂條例》 (Bribery Prevent Ordinance) 拘捕有關的違反人士。
- 3 為了不想替有關部署狗仔隊的報社作宣傳，所以該報紙的名稱欠奉。
- 4 這是香港電台電視部的一部同名劇集的插曲，該劇集是由1972到1981年的黃金時段播放，劇集內容是現實地描繪當時社會的實際問題，如：貧窮、貪污、市民被不公平對待和絕望，但這些問題在劇集中最後會由社區內市民的忍耐和互助所克服。
- 5 賴依芙 (Naïve) 這匿名來自一新聞故事，事源在2001年香港記者在向江澤民發問了一不太客氣的問題，江總理就大發雷霆地回應香港記者："The Hong Kong young reporters are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匿名的藝術創作者用了江總理句中的Naive為自己的偽名，作為政治的雙聯語，以自嘲他對中國中共政權的不滿。
- 6 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是基於香港的憲法規定，特區政府可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需要制定法例來禁止任何涉及下列行為的活動：叛國 (treason)、分裂國家 (secession)、煽動 (sedition)、顛覆 (subversion)、反對中國的中央人民政府、或竊取國家機密、禁止外國政治團體或組織進行政治活動。

陳政成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博士候選人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期 2003年1月30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十期 (2003年1月30日) 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